



1937年11月，光华大学男生宿舍被炸毁前后对比照片。图片提供/华东师大档案馆

日，工部局发出通知，勒令大夏大学在24小时内迁出英租界。6日，大夏正在召开全体师生大会，讨论援助工人方法时，英兵突然闯入校内，要求学校立即搬迁，并强行占领了校舍。

校舍被占后，大夏大学临时迁至槟榔路（今安远路）潘家花园继续办学，并函请校董虞洽卿向工部局交涉。14日，《申报》刊载大夏大学学生会消息，表示将另组驻沪代表会，代表全体学生参加五卅运动，并公布具体会务。

汤涛认为，对于大夏大学而言，革命性“与生俱来”。1924年4月，厦门大学发生学潮，当年6月1日，厦大的330余名师生脱离厦大北上上海筹建新校，最初名为“厦大”，即“厦大”之颠倒；后来取“光大华夏”之意定名大夏大学，成为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。

汤涛认为，当时革命的中心在南方，大夏师生把南方的革命进步思潮带来了上海，并在青年群体中广泛传播。

对于圣约翰大学师生在五卅运动中离校创立光华大学，汤涛认为，其中的动力可以追溯到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。新文化运动发端于北京，收尾在上海，当时在圣约翰的大学生和中学生，就已经受到进步思潮的感染，“即使没有成为革命青年，也成为了一个充满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的青年”。

而且，圣约翰大学实行的是精英教育，学生的思想见识超越一般人，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反抗帝国主义对中

国的侵略，早已有所觉悟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开展后，他们的爱国反帝意识进一步被激发。在看到五卅惨案中同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何秉彝等人被列强杀害，同情与悲愤之情必然激涌。

支持光华大学成立的主要有三方面的力量：一是进步的士绅阶层，如捐地出资的原圣约翰大学学生的家长王省三、时任沪海道尹的张寿镛等；二是上海的工商业和金融阶层。如实业家荣宗敬、钱永铭、虞洽卿等；三是一批留学美国归来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，如余日章、刘湛恩等，他们因为在海外的见闻，爱国的民族情感更加深厚。

另外，20世纪20年代的上半期，中国的教育界大量被外国教会控制。汤涛列举说，据1922年11月《新教育》杂志统计，当时全国教会学校721所，学生33.2万，占全国各级学生总人数的6%强。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无法容忍本国的教育事业大量被外国人控制，因而“收回教育权”的思潮涌动，这也是促成光华大学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收回教育权运动在“五卅”前后达到高潮。1925年12月北洋政府公布《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》；1926年以后，外国在华所设各级教会学校多数在中国政府立案，改由中国人任校长，并参照中国教育体制作调整。五卅运动，促成了中国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。**民**